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钧

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

王洪涛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H059/88


2008

柏然 许 钧

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理论研究

王洪涛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
理论研究/王洪涛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409-1

I. 翻… II. 王… III. 翻译理论-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现代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82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理论研究

王洪涛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250册

ISBN 978-7-5327-4409-1/H·808

定价: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翻译研究学派与中国当下的翻译学研究

——写在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之前

前
言

王洪涛送来他的博士论文，嘱我写几句话，原在意料之中。

我和洪涛认识，早在他考博前和硕士毕业前。他利用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地利之便，前来听课，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考博以后将我所上的两门博士课再听一遍，总共听了两遍，功课学得自然扎实。其天资聪敏自不待言，而他听课仔细，又勤于做笔记，提问题，所以学习效果很好。可能是师承关系的影响，洪涛在思维方式和写作方面也较下工夫，所以指导起来似乎不大费劲，选题也来得容易些。

这个选题，基本上是洪涛的自选题，我只是反复听取他的进展和意见，最后表态确定下来的。其根据和过程大体如下：1. 一门之内，学生的天性与志趣不同。有的偏于文学和作品评论，有的偏于中国译论和国学研究，而洪涛的学业则既偏于理论，又偏于西学，而且是侧重现代西方译论，由此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兴趣；2. 按照他的初衷，他能够找到一个学派而不是一位单独的理论家进行述评。在南开的博士论文中，这是继多元系统论和德国功能学派的评述之后，又一个以学派为研究对象的选题，它超越了早期以奈达等个人为研究对象的题目，显得更有理论深度和更大

的评论空间;3.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收集资料,在他不断和我谈话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翻译研究学派,有了比较适中的了解,也就是在基本的学术的事实之后,有了一些理论性的认识;4. 最后,根据他平时的理论修养、思维习惯和批评性论文的写作要求,再加上一定的思路上的指导,我认为他已具有进行理论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关键部位有了一些创新性的想法。于是,这个题目就选定了。

最后答辩的论文题目是这样的:《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理论研究》,侧重于从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两个方面对于翻译研究学派进行理论研究。大体说来,这篇关于翻译研究学派(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包括三大部分:1. 绪论部分论述了研究对象、方法与设计(在出书时有一些修改);2. 正文部分论述了该学派的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与分期、研究范式与思路转变、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等方面;3. 结论部分,讨论了翻译研究学派的贡献与不足,以及对该学派的借鉴与规避。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完备而符合逻辑的研究程序和写作成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在国内进行翻译研究学派系统研究的空白。关于这篇论文的评价,我想引用两段校外专家的评论(摘自《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

论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追述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兴起、发展以及逐渐成熟的过程,特别注意从历史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这一学派产生的原因,它的母论以及它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令人满意地理清了翻译研究学派的来龙去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翻译研究学派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加以研究,既看到它的优点,予以充分肯定,也同时指出它的不足。这说明作者对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见解,并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是值得肯定的。

论文的点睛之笔是对翻译研究的展望。在充分肯定翻译研究学



派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构想了一个所谓“社会翻译学”,并对社会翻译学做了阐述和界定。这种在翻译学科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一种翻译新学派设想的办法,并不多见,是很有创意的。

当然,对于论文的缺点,专家一点也没有因为客气而隐瞒。例如,有的专家指出“论文在修辞上可以更加精练一些。个别地方有为了修辞效果而影响表达精确的情况。”

对于该研究本身我多少有一些评论性的话,主要是想把研究引向深入,然后就这个题目以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命运与功用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然后再具体到我们如何从传统的国学转向现代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讨论到一些当前的问题作为结束。

首先是西方理论作为一个学术事件,它发生了,如何研究?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事件的翻译研究学派,它发生在西方或人类的学术史上的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大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资源如何?创始人个人的独特状态和特殊贡献是什么?以及事件发生的历程包括阶段划分以及随后产生的影响如何?甚至包括西方和中国学界对这个理论的评价与反应,都可以包括在事件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且值得研究。洪涛的论文,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问题属于这个领域。例如第二章,关于翻译研究学派发生的理论背景,其爬疏整理,涉及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启发、俄国形式主义和多元系统论的影响,以及文化研究与解构主义思潮的导向等方面,基本上属于近因的研究,而原因的研究略嫌不足。就近因来说,究其实际,由于许多事情都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一翻译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现代思潮和学术向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状态转变的关键时期,这就使得事情格外复杂,扑朔迷离,难以决断。例如,多元系统论,就其代表作品的发表时间而言(The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ed Litera-

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by Itamar Even-Zohar, 1978/ revised 1990), 实际上和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作的时间(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y James S. Holmes, 1972/ revised several times) 不相上下, 甚至后者还要靠前, 但又多有修改, 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 期间有些时候各种理论迭出, 交相辉映, 按照一般的确定前后以判别因果的影响关系, 就很难说谁是谁的背景了。

另一方面, 如果将西方文化中的学科和学术发展的理论背景, 和某一理论所依托的直接的理论来源和文化资源详加区分, 而且能将前者转换成后者, 详加研究, 那么, 将会使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引向深入, 而许多重大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当然这样一来, 研究的彻底性和难度的增加就越发显示出来了。正是抱着这样的期待, 我们希望该论文能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可喜的是, 在第六章“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的题目下, 我们发现作者不仅利用一定的篇幅说明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学派的影响作用和渊源关系, 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翻译研究学派与文化转向的深层的影响关系。作者指出:

可以说, 多元系统论作为一种从文学领域逐渐扩展开来的文化理论, 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文化指向。当该理论的创设人佐哈将其应用到翻译领域中来时, 这种文化指向自然而然地被移植到翻译学研究中来。后来佐哈思想的承继者图里、兰姆伯特和勒弗维尔在其翻译学研究中多元系统论的积极应用促成了翻译学与多元系统论的联姻, 而这种联姻的结果之一就是翻译学从多元系统论那里承继了一种文化基因, 进而形成了后来的文化转向。(本书, 第 206—207 页)

如果说, 作为事件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 在该论文中得到了基本的事实澄清和较好的说明(事实上关于理论来源的说明还有待于进一



步加强和澄清),那么其次,翻译研究学派作为一个理论系统,如何认识和评价它的理论价值和知识系统,包括基本范畴、逻辑架构、研究范式、哲学基础、现实指向,等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洪涛的论文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六章,都给出了很好的研究,其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例如,在第四章论述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范式时,作者并不是直接借用库恩的较为固定的范式概念,而是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理论致思特点,体现为流动和转变的一系列概念,诸如,“研究取向:从源语走向译本;研究对象:从形式走向功能;研究性质:从规范走向描写;研究角度:从共时走向历时;研究视野:从微观走向宏观”。虽然这里的说法和修辞设置有些过分整齐划一的逻辑化倾向,然而不可否认,其研究思路是活跃的,理论概括基本上是精当的。

由于翻译研究学派不是一个人理论的总结,而是围绕翻译学的建设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成果发表的持续多年的学术活动,它的理论概括既要求能够疏通大意和理出思路,也要求能够尽量说明各个理论之间的关系,最后则要求能够看作一个沿着某一主线而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应当说,在这一方面,在进一步作为总体的理论的单个评析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作者紧紧抓取每一理论家主要理论框架,围绕翻译学的学科架构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做到思路清晰,表现到位。其中包括霍姆斯和巴斯奈特的翻译学学科框架图,图里的“描写翻译学内部关系”图、“描写翻译学与理论翻译学之间关系”图,以及“(纯)翻译学与其应用性延伸部分之间的关系”图,等等,不仅以模式化的方法清晰地示出各理论的基本思路和面目,而且给出简要而中肯的评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借助图释介绍和分析各个理论的时候,能够沿着一条学科发展的主线展开分析,使得这些单个的理论前后相继,相互说明,构成粗略的体系。例如在说明图里对于霍姆斯的理论继承关系的时候,作者阐述了下



列分析要点:

1) 图里以功能为导向阐发和论证了描写翻译学内部各分支的关系,基本上理清了面向产品、面向过程和面向功能三个分支的关系;

2) 图里对理论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纯)翻译学与应用性延伸部分之间关系的界定,较之霍姆斯迈进了一大步,从模糊和宽泛走向明晰和细致;

3) 图里将描写翻译学置于“枢要性地位”,使其能够为理论翻译学提供形成“法则”的材料和证据,又能够使其实现理论翻译学与应用性延伸部分之间的连接和沟通。

前
言

当然,作者认为图里的思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以功能为取向进行描述时,会使得产品、过程和功能三个部分之间失去平衡,从而缩小描写翻译学本身;二是在强调“纯翻译学”的时候有将“应用性延伸部分”排斥出去的趋势。

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学术性的和有一定见解的。联系到国内关于翻译研究学派,以及其他西方译论流派的研究,长期流于浮泛难以深入下去的情况,不免令人担忧,而这样的研究还是值得关注和肯定的。

如何评价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尤其像翻译研究学派这样一个对于翻译学具有奠基作用的理论流派,是一件严肃的而且是很难的事。然而更难的,是究竟如何利用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促进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乃至建立中国的翻译学理论。毋宁说,后者的创造正需要凭借前者的评论性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转向动因的时候,作者已经肯定了它的三个意图,即揭示翻译的文化属性,扩充翻译的外部研究,并借以提高翻译的学科地位。同时又指出翻译研究学派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翻译的语言性



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翻译的外部研究,这样就有可能将翻译研究引向一种注重社会和文化的归宿和归结论。作者认为,由于泛文化主义的影响和文化本身难以界定,最终将导向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关于翻译研究学派的归宿,是否一定要归结为社会翻译学(本人更喜欢“翻译社会学”,但在这里不便论证),而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和选择,甚至包括翻译研究上的文化转向,是否一定只能是一个外部的研究,而没有或不可能深入到翻译的心理层面与文本分析方面,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毫无疑问,作者企图建立社会翻译学的努力,是有一定的认识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值得一试的。事实上,在对书稿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作者着力较多的也是在社会翻译学的建设上做文章,其中包括名与实的正名论的研究和若干具体内容(特别是翻译与社会和社会与翻译双向关系)的探讨。应当说,这一部分论述不仅作为这篇博士论文的一个创新点具有鲜明特色,而且很可能成为作者今后的学术致思的一个方向,作为作者对于翻译学建设的一种持续的努力目标。我期待这种努力能取得显著的成绩!

关于洪涛的这篇论文的直接的评论性意见,暂且讲到这里,而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译论以便进行理论思考,以及如何将其融合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进行学术创新,则有待于开始。在这一方面,考察一下有关的现象就不难发现,在借鉴西方译论来建设中国自己的翻译学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三种习以为常的致思途径或研究层面。首先是概念的借用。对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并不去深入地理解和全面地去求掌握,往往记住一些关键词语也就是基本范畴然后加以直接借用。在这一方面,直译意译固然不好追溯到哪一个人的贡献,而动态对等之于奈达,归化异化之于韦努蒂,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一个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里,这种借用几乎成为我们翻译研究的关键词,舍此几乎就没有理论



思维了。但真正的创造性的概念借用并不容易,关键是在一个新概念里面要注入更新的思想,或者将它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内进行创造性思考,以便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的一部分。例如,许多人喜欢谈“范式”,可是库恩的范式是科学哲学概念和精通科学史的认识结果,它是对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概括,而这一概念本身几乎是不需要任何论证的理论公设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由于缺乏翻译史和学术史的通观性的认识,和打通中西学术与古今传统的功力和努力,致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找不到实际的意义和有效的应用范围,许多“范式”之谈变为装点 and 习惯,已经失去其洞察历史之精义,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凡是”了。我们可以说,不思考问题只借用一个概念,或者不去进行理论思考而只是重复某些概念,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学术挪用,终究是难以化利用为创造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第二种借助西方译论和西学的方法,像许多人所认为的,就是直接借用它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性的理论创造。但是,在这一方面,至今成效甚少。无论是实证研究的方法还是哲学思辨的方法,都有人提倡(这种提倡往往带有压制另一方的倾向),但都难以继承下去,落实到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课题中去,乃至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得心应手的创造工具。多年以前在西安,我曾经问过奈达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翻译研究应当是思辨性的还是实证性的?”奈达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使我很失望。后来,在霍姆斯的译学框架和学科定位中,终于看到了他以翻译学为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说法。我以为相对于奈达是一个进步。尽管实证的研究也可以有一个在理论上思辨的层次和方法,甚至需要一个人文价值的思考前提,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霍姆斯的论断还直接引发我思考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最为关键的但又是基础性的东西,就是要不要进入西方当下翻译学的问题和框架,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下去。

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认识问题。一个是有人会说西方学术有自己的问题,中国学术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不同如何借鉴?这当然也不错,不过归根结底有一个何谓“国学”、何谓“西学”的问题?如果以“国学”为传统的涉及中国人自身社会文化的安身立命的学问(一个保守性的界定),则西学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和普遍科学性的学科规模与传统(当然西学也有它的来源和传统部分)。所以国学与西学始终处于一个不怎么恰当的对立关系,需要学科地位上的重新安顿。而且我们不能总是采用中西对比和对立态度如此这般地说一些对立的话,或者说一些大而无当的极度概括的话。“五四”以来试图中西打通古今贯通的“通人”之学姑且不论,作为翻译学的理论工作者,我们至少必须认真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来面对如何应对与建设新的学术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学术视野之下,一定的学科自然有它的基本问题,在面对一个新兴学科的时候,中西学术的路径不同或所处的阶段不同,可能对于该学科的问题的认识不同,但毋庸置疑,都有一个涉入深浅的问题、介入角度的问题以及最终效用的问题,要不就是游离于学科之外的问题。所以,如果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拒绝或不能进入现代学术规范和学科问题,就永远只能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永远无法超越,因为我们对此领域可能无所贡献,也无从言说。

另一个就是如何面对翻译学的理论框架的问题。事实上,在翻译学领域,我们曾经设想不同的学科框架(例如刘宓庆),也修订过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例如杨自俭),这些无疑都是有开拓精神和开创之功的。但是,我们为何不可以在认真面对霍姆斯的翻译学研究框架和图里的研究框架的时候,思考一下自己的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翻译学定位,为何不可以选择一个中等程度和规模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和依托,追寻其中基本的问题长期坚持下去,而不是不断地跟风,也即跟西方